

民主之舟 向新中国进发

上世纪前叶，风雨如磐。对于这群文化精英来说，舟行万里、甚至去国怀乡都不稀见，但是发生在1948年、1949年间这一趟北上的行程，却注定令他们永生难忘。

出发，将朽败的旧时代留在身后，向着人民的新中国进发。郭沫若、茅盾、叶圣陶、柳亚子、曹禺、郑振铎、李达、马寅初、蔡楚生等等……我们今天熟知的一长串闪光的名字，都曾在此行程之中。在中国共产党“五一口号”的召集下，他们乔装改扮，舍陆登舟，冒险穿越重重的海陆封锁线，从香港沿大陆海岸线一路北上，去往当时的东北解放区，完成了一次精神、信仰的大迁徙。



1948年12月3日，第二批由港北上的民主人士乘“华中轮”胜利抵达丹东附近的大王岛，泊船上岸，放下行李，欣喜合影。左起：翦伯赞、马叙伦、宦乡（后）、郭沫若、陈其尤、许广平、冯裕芳、侯外庐（后）、许宝驹、连贯、沈志远（后）、曹孟君（后）、丘哲、安东地区中共领导人。

1948年，解放战争进入关键决胜阶段，中共中央同时也加紧了另一条战线，即团结民主精英、文化人士共商国是、筹备建国方面的行动。其中，也代表新中国对文化精英们发出了极为具体而迫切的邀约。

自抗战爆发以来，在文教、学术等众多领域，许多进步文化人为民族救亡而建设、奔走，但在抗战胜利后，他们却因国民党专制统治

这真是隐秘而艰险的旅程，靠单打独斗绝不能成行。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，1948年中共香港分局和香港工委组成了由潘汉年、夏衍、连贯、许涤新、饶彰风为成员的五人小组，并抽调《华商报》等单位的人手，形成专门工作班底，开始高效实施起联络个人、租船购票、掩护撤离、全程护送等各个环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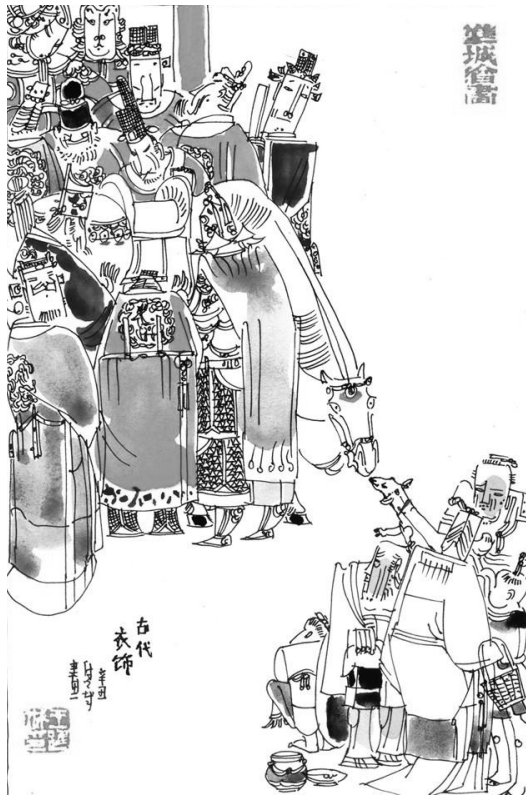
在1947年前后，周恩来就指示共产党员钱之光等人，开通了从大连至香港的海上货运通道。这

郭沫若是1947年11月从上海来到香港的。作为社会贤达中知名度最高的一位，他一到就积极参与到进步活动中。特别是在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“五一口号”之后，他频繁通过写作、发表声明、出席座谈会等形式，积极投身“新政协运动”。

到了8月炎夏，夫人于立群已悄悄开始帮郭沫若准备冬装了，因为他即将在中共香港分局的安排下，乘坐货轮北上。

与此同时，郭沫若在香港《华商报》上连载的“抗战回忆录”（后更名为《洪波曲》）也正火热进行。眼看出发日期临近，郭沫若加快速度，到11月21日早上将全部文章赶写完，预留给报社。23日，他就与马叙伦、许广平等第二批北上解放区的民主人士一起，登船驶离香港了，后来逐日持续推出的文字，都是掩饰行踪的“障眼法”。直到郭沫若一行到达东北解放区，连载才全部结束。他们所乘的“华中轮”客舱狭

古时不可乱穿衣



在现代，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衣服的款式和颜色，可以随心所欲地穿着自己喜欢的衣服漫步大街小巷。然而，在古代，衣服却不能随便穿，关于衣服的颜色、花纹、长短等都有严格的规定，要是穿“错”了，轻则被打板子，重则被砍头。对此，现在的人一定觉得不可思议，不就一件衣服，有这么夸张吗？事实的确如此，因为在古代，衣着不仅仅是遮掩身体和保暖的工具，更是一个人身份、地位的标志和象征。也就是说，皇帝穿什么，大臣穿什么，百姓穿什么，界限分明，不得僭越。

从衣服的颜色来说，达官贵人一般穿金、黄、红、紫等色彩艳丽的衣服，所谓“衣锦还乡”就是这样的。而平民百姓则只能穿青、蓝、黑、白等色彩单一灰暗的衣服。汉代曾有“散民不敢服彩”的规定，没有取得功名的人多穿白衣，于是“白衣”便成为当时平民的代名词。至于官员的服装颜色则是以品级来定的，以唐朝为例，三品以上官员穿紫色衣服；四品官员穿深红色衣服；五品官员穿浅红色衣服；六品官员穿深绿色衣服；七品官员穿浅绿色衣服；八品官员穿深青色衣服；九品官员穿浅青色衣服。

至于皇族使用的衣服颜色则更为讲究。由于秦人崇尚黑色，帝王的正装都为黑色。秦灭亡以后，代表着尊贵的黑色渐渐地被黄色所取代。按照我国阴阳五行的说法，黄色代表土地的颜色，穿黄色的衣服象征着占有土地，是天下的主宰者，于是，黄衣就成了帝王的专属。通常情况下，只有皇帝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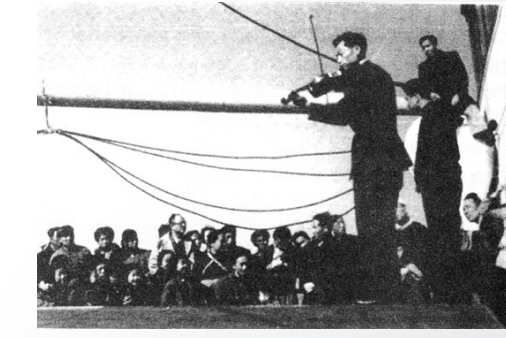
1949年元旦的《华商报》，刊登了茅盾所写的文章《迎接新年，迎接新中国》。这是茅盾此番借港近一年来的文学写作的收笔之作。刊出前五日，1948年12月26日，他也已离开了香港，与民革的创始人李济深等人一道，作为第二批民主人士登船北上了。

在船上，茅盾准备了一本手册，请大家签名或题诗作词。李济深题写了一段话：“同舟共济，一心一意，为了一件大事！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、民主、和平、统一、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！同舟共济，恭喜恭喜，一心一意，来做一件大事。前进！前进！努力！努力！”

叶圣陶和柳亚子两位文学家都在第四批北上的文化精英名单中，他们分别留下了宝贵的“北上日记”（叶）、“北行日记”（柳）记载这段不寻常的旅程，为后世保存了许多珍贵细节。

柳亚子细心地在此段日记起始处，一一列明了“同舟共济”每一位同行者的姓名、年龄和籍贯，可知与他同船的有陈叔通、马寅初、郑振铎、宋云彬、曹禺、王芸生、徐铸成、赵超构等27人。叶圣陶则写道：“此行大部须冒充船员身分，改穿中式短服。此时皆改装，相视而笑。……余之身份被派为管舱员。女客则以搭客身份登轮。”

1949年2月28日，“华中轮”正式起航。这时，山东沿海已经解放，货轮直驶烟台，航程较短，旅客中文艺



音乐家黎国荃在“宝通轮”的联欢会上演奏小提琴。

第七批北上的，大多数是应邀到北平出席第一次文代会的代表。同船的有：李达、钟敬文、王亚南、黄药眠、陈迦冬、舒绣文等100多人。香港工委派出文委副书记、作家周而复带队，还派了姜椿芳、曹健飞两人随船协助。这次租用的是一艘太古船务公司的客货轮“岳州号”，1949年5月5日下午从香港起航。据周而复的回忆录描写，“到了公海上，在下面统舱休息的人们，纷纷走到甲板上，熙熙攘攘，谈笑风生，互倾衷肠，盼望尽快到达解放区。”

据周而复回忆，著名哲学家李达也在此行中，他一点也不晕船，而且还能安心读书、研究哲学。他们俩曾数次讨论毛泽东所著的《实践论》《矛盾论》，都十分信服。李达迫切地表示，“到解放区后，希望看到润之同志（即毛泽东）”，周而复汇报上去，很快就安排好了，5月18日，建国百忙之中的毛泽东在北平双清别墅会见了李达。

1949年7月2日，中华全国文学

人才又多，因而海上生活并不寂寞。柳亚子天天吟诗，喜与别人唱和，被大家称为“诗翁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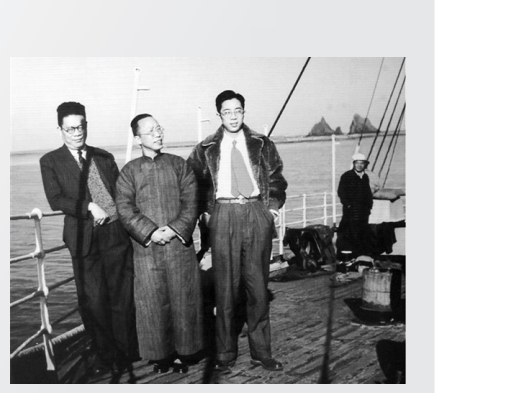
3月1日黄昏，大家第一次开晚会。柳亚子在日记中写道，晚会上“有平剧清唱、民歌、粤唱、讲古、魔术及集体游戏等”。

那天，叶圣陶吟咏至深夜，得七律一首。诗中写道：“南运经时又北游，最欣同气与同舟。翻身民众开新史，立国规模俟共谋。蟹土为山宁肯后，涓泉归海复何求。不贤识小原其分，言志奚须故自羞。”在同舟共济的氛围中，点出他们团结一心参与北上立国，要开创历史，又谦逊地表达了自己愿为新政协尽绵薄之力的热情。

1948年11月30日，华中轮即将靠岸。左起：宦乡、马叙伦、周海婴。

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（第一次全国文代会）在北平（今北京）开幕，这是来自全国各地、各领域的文艺工作者的首次大会师，在新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会前，从香港或经香港北上参加文代会的代表，总数在一百人以上。

1941年5月，阎宝航应邀参加一次有德国驻华使馆军官参加的宴会，他先是从右任口中得知德国将于6月20日前一周内进攻苏联，又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，得到确认后借故离开宴会，想方设法向周恩来汇报。这份情报在苏德战争爆发一个半月后，通过中共中央及时地通报给苏联最高领导人。



行进中的“华中轮”。

正是由于中共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，加之其他情报来源的佐证，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取时间提早进入战备。苏德战争爆发后，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，中共中央提供的情况使苏联提早二十四小时进入战备，特对此表示感谢。

1944年，阎宝航以陈诚让其写分析日本何时进攻苏联的文章为借口，从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巧妙地获取到日军在东北部署的详细情况，包括陆空军的配置、军事要塞地点、布防计划、兵种兵器、部队番号、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，均十分清楚。

阎宝航拿到这些材料后，立即交给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拍照，并及时通报给苏联。在这样重要情报的配合下，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，苏联红军所向披靡，几天内就将关东军苦心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。中国东北迅速得到解放，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。（据《人民日报》）

（据《羊城晚报》）

能穿黄色的衣服。不过，唐时，地位较高的宦官也可以穿黄衣，如白居易在《卖炭翁》中所写“翩翩两骑来是谁？黄衣使者白衫儿”。除此之外，有功的大臣也可以穿黄衣。我们经常看电视里看到，某人立了大功，受到皇帝的特别嘉奖，即被授予黄马褂一件。得到皇帝赏赐的黄马褂，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也没几个人敢随便便就穿着黄马褂跑到外面去。

从衣服的材质来看，统治阶级与平民也有很大差别。古人穿的衣料大致分为两大类，一类是丝织品，旧时称为“帛”，其种类非常繁多，如缕、罗、绸、缎、锦、纨、绉、绢、縠、縗、素、縗、绮等。这类材质只有达官贵人才能穿，正如宋朝诗人张俞在《蚕妇》中写的那样：“遍身罗绮者，不是养蚕人。”另一类是麻葛织品，即：麻布和葛布，为普通老百姓所穿，因此，“布衣”后来成了平民的代称。

此外，关于衣服的花纹也十分有讲究。唐时，七品以上官员的服装可配花纹绶；五品以上官员的服装可配雕、鹞、鱼、雁、花草等图案。《唐会要·舆服》载：“诸王饰盘龙及鹿，宰相饰凤池，尚书饰雁，左右卫将军饰麒麟，左右武卫饰虎，左右鹰扬卫饰鹰，左右千牛卫饰牛，左右豹卫饰豹，左右玉铃卫饰兽，左右监门卫饰狮，左右金吾卫饰豸，都督、刺史饰山形纹。”由此可见，服饰上的图案绝不可以随便绘绣，尤其是天子使用的龙纹，如果有人胆敢穿上绘有龙纹的衣服，那就是大逆不道！很可能被诛灭九族，后果很严重。（据《西安晚报》）

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

在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枫香镇的苟坝村，有一个红军马灯馆，陈列着30盏马灯。一盏盏马灯造型各异，积淀着历史的风霜。

马灯照亮光明路

80多年前，一盏盏马灯见证着一段珍贵历史。1935年2月下旬，中央红军二渡赤水，再次占领遵义。3月10日凌晨，中革军委接到红一军团的急电，请求攻打打鼓新场（今贵州金沙县城）守敌。打鼓新场堡垒坚固，易守难攻。1935年3月10日至11日，中央红军在苟坝村召开扩大会议，围绕打还是不打，一场激烈争论在苟坝展开。

对此，原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任仲泉在《长征行》一书中，作了详细记述：会开了整整一天，争论很激烈，只有毛泽东一人不同意打，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，不能“啃硬的”，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。

周恩来在《党的历史教训》中回忆：“别人一致通过要打……但毛主席回去一想，还是不甘心，觉得这样不对，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屋里来，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，还是想一想。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，一早再开会议，把大家说服了。”

后来得知，蒋介石已令重兵驰援打鼓新场，红军如果真去硬攻，必将陷入重围。3月中旬，中央成立由毛泽东、周恩来、王稼祥组成的新的“三人团”，以周恩来为首，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。如今在苟坝，当年毛泽东走过的田埂小路被命名为“毛泽东小道”。从毛泽东当年住地出发，步行前往当时周恩来居住的五间，大约1.5公里的行程。窄窄的乡间小道，坡坡坎坎，弯弯绕绕。

“苟坝会议是我们党探索科学民主集中制的一次重要实践。”遵义党史研究室主任张野生说，苟坝会议表明，共产党员讲大局、有担当，发扬党内民主，最终作出符合实际的科学决策，走上正确的道路。（据新华社）

拾遗

陈毅：曾在毛主席床上睡午觉

1960年9月，中国和古巴建交。古巴外长劳尔·罗亚·加西亚访华时，毛主席恰好去外地视察，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特意在中南海设宴招待。宾主刚刚入座，陈毅就站起来举杯宣称：“此处是毛主席办公、看书和休息的地方，今天我在这里招待远道而来的客人，是由衷地表示对古巴人民和你们的尊敬及欢迎。”劳尔·罗亚·加西亚一行人深感荣幸，都很开心。

宴毕，陈毅送别客人回来后提出：现在我不想走，我要在毛主席的床上睡个午觉。陈毅进去后，倒在毛主席的床上，呼呼地睡着了。

睡醒后，陈毅对多年负责中南海毛主席日常生活工作的张宝昌说：主席睡的木板床这么硬，你们怎么也不给他换一换啊？张宝昌答道：主席睡惯了，不让换。张宝昌还回忆说，毛主席回来后，听说陈毅又是大宴宾客，又是睡他的床，忍不住哈哈大笑说：陈毅就是那样的人。（据《天津日报》）

阎宝航两获重大国际战略情报

熟悉二战历史的人都知道，1941年6月22日，德国法西斯向苏联发动了全面袭击，苏联卫国战争就在这一天爆发了。而这恰恰与中共中央发给苏共中央的情报完全吻合，特别是其中两份重要情报，就来自我党打入国民党高层的战略情报员阎宝航。

1941年5月，阎宝航应邀参加一次有德国驻华使馆军官参加的宴会，他先是从右任口中得知德国将于6月20日前一周内进攻苏联，又不动声色地向孙科打听，得到确认后借故离开宴会，想方设法向周恩来汇报。这份情报在苏德战争爆发一个半月后，通过中共中央及时地通报给苏联最高领导人。

正是由于中共准确地向苏联通报了德军突袭的时间，加之其他情报来源的佐证，使得苏联红军能够争取时间提早进入战备。苏德战争爆发后，斯大林曾致电毛泽东，中共中央提供的情况使苏联提早二十四小时进入战备，特对此表示感谢。

1944年，阎宝航以陈诚让其写分析日本何时进攻苏联的文章为借口，从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巧妙地获取到日军在东北部署的详细情况，包括陆空军的配置、军事要塞地点、布防计划、兵种兵器、部队番号、人数以及将领姓名等，均十分清楚。

阎宝航拿到这些材料后，立即交给苏联驻华使馆武官罗申拍照，并及时通报给苏联。在这样重要情报的配合下，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后，苏联红军所向披靡，几天内就将关东军苦心经营十几年的防御体系彻底摧毁。中国东北迅速得到解放，加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进程。（据《人民日报》）

真诚待人的老舍

老舍待人真诚、厚道，细致入微。他很好客，每天下午，家里来访的客人不断。作家、画家、戏曲、曲艺演员等，老舍都以礼相待。

每年，老舍要把北京市文联的同仁约到家里聚两次。一次是菊花开放的时候，赏菊。一次是腊月里他的生日。酒“敞开供应”，客人随意，能喝多少喝多少。菜都是老舍亲自掂配的，他有意让大家尝尝地道的北京风味，有一次用一瓷钵芝麻酱炖黄花鱼。老舍家的芥末墩也非别人家可比。有一年，他特意订了两大盒“盒子菜”。直径三尺许的朱红圆漆盒，里面分开若干格，装的是火腿、腊鸭、小肚、口条之类的切片，都很精致。熬白菜端上来了，老舍先举起筷子：“来来来！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！”

老舍对文联干部很了解，他不看档案，也从找人“个别谈话”，只是从平常的谈话中了解一个人的水平和才气，比看档案要准确得多。他爱才，对有才华的青年“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”，不乏溢美之词。老舍平易近人，没有一点架子，他和下属的关系不像上下级，更像是前辈与后辈，这让大家感到很舒坦。

老舍极看重齐白石，他们也是至交。白石老人家家里人多，每天煮饭的都是他用一个香烟罐一下一下量。有人曾提出把老人接出来住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不要再操心这样的家务事了。老舍知道了，给拦了，说：“别！他这么着惯了。不叫他干这些，他就活不成了。”

老舍的心里总装着别人，正像他的字“舍予”，“舍弃自我”，人如其名。（据《人民政协报》）